

目 录

- 封面题签 周汝昌
- 前 言 (1)
- 镇江内河航运业
——从鸦片战争到全国解放 市工商联(5)
- 镇江国药业
——从鸦片战争到全国解放 市工商联(8)
- 镇江江面的古今变化
——从“看海日”和“观潮”说起 江慰庐(15)
- 镇江旧城的穿城河——关河 杨方益(25)
- 润城旧事诗话(选录) 杨积庆(29)
- 千古绝唱《满江红》
——岳飞在镇江地区宜兴的三次题词 韩其楼(35)
- 古城——镇江 刘雨男(41)
- 关于沈括的梦溪园 王 瓷(46)
- 焦山访《瘗鹤铭》刻石 陆九皋(55)

前　　言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同志倡导的。一九五九年四月，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之后，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主席曾在招待六十岁以上委员的一次茶会上提出，“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最大的时期，从那时到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把它记载下来。”并建议通过政协和委员们将六、七十年来看到的和亲身经历的社会各方面变化的史实、人物等写下来，“使后人知道老根子和供研究历史的参考。”政协推动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重要的创举，通过政协，可以有组织地广泛发动过去几十年来许多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和见证人，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把历史面貌较为真实地记录下来，尽量地及时地弄清过去许多历史事实的真相。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前认真贯彻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市委的领导下，得到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六年，先后征集的资料有四十多万字，为研究镇江等地的历史提供了大量比较有价值的资料。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摧残和破坏，大批文史资料被洗劫、销毁和失散，文史工作被迫停顿了十三年。现在，那些了解本地历史情况和革命活动情况的老人和老党员，其中有不少人已先后去世，健在的为数不多，而且他们大多数已是七、八十岁高龄，耳目日益不灵，因此抢救史料，是一项重要的紧迫的工作。

镇江是江南古城之一，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

在历史上很早就是水陆交通的枢纽，成为南北货物的集散地。一千多年前镇江的商业、手工业就相当发达，南北朝时酿酒业就很有名，有“京口酒可饮”之说。唐代曾在长安（今西安）举办“水上运输展览会”，几百条船上所展览的都是南方各地所生产的粮食、土特产和各种手工业品。当时丹阳郡的船，装的是京口的绫衫缎。镇江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如鸦片战争时，英国侵略军在一八四二年进攻镇江，就遭到镇江人民和清朝军队的英勇抵抗。一八五三年太平军占领镇江后，于城外九华山、京岘山和清军进行了多次的血战。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李竟成等从上海来镇，对清军进行宣传，策动起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九二四年恽代英、夏霖等同志先后来镇江开展工作，以后党的组织逐步发展，党的活动在各个历史时期也不断开展。从以上略举的一些事例，说明镇江有大量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急需收集、整理和加以编写出版。这项工作，不仅可以为研究镇江历史、续修镇江地方志，提供丰富的史料，而且其中有些史料，对全省甚至全国的历史研究，也具有一定价值。

我们从今年下半年起，开始征集整理了一部分资料，现编印出《镇江文史资料》第一辑。本刊所选的资料，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以及个人研究心得，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人都一定有局限性，所述史实可能不尽翔实，不够完整，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刊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以备历史研究工作者参考。

我们征集、选稿的范围根据“广征博采，抓住重点”的原则，主要征集镇江地区（重点是有关镇江市的资料，由于历史上润州、镇江府等都包括几个县，有些历史事件，也涉及到附近有关的县、因此如有镇江地区各县的来稿，也适当选

用)从戊戌变法以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各个时期的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内容包括政治、军事、工商、科技、文化、民族、华侨、宗教等方面的历史资料和历史人物的资料。同时要努力征求各个时期的原始资料如函电、手稿、日记和遗作等。还要注意征集过去社会生活方面的资料，如妓院、占卜、巫婆、帮会等，因为现在不征集，以后将难以弥补。当然，广征博采，还必须把握史料价值高的或有现实政治意义的资料，对这种资料要作为重点进行征集，尽先出版。鉴于熟悉镇江历史文献的老人也越来越少，经过“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四旧”的浩劫，私人收藏的地方文献，损失很大。现在仅存的一些资料，保存在各单位和少数私人手中，如保管不善，易于损坏和散失，必须抓紧时间，加以充分利用。因此，对戊戌变法以前的镇江历史资料，也要注意征集和选编。

我们征集选稿的标准，首先要求真实。周恩来同志生前再三强调，撰写文史资料要“存真、求实”“不要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笔”，这是文史资料工作的一条根本原则和指导思想，也是我们选编稿件的标准。周恩来同志还指出：“只要忠实于历史，按照自己所亲历、亲见、亲闻的事实来写，可以不拘观点、不拘体裁”。因此只要有史料价值，亲历记、回忆录、短篇叙述、长篇记载，我们一律欢迎。撰写文史资料，不是写小说、编演义，不能虚构臆造。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不夸大、不缩小，不粉饰，不讳过。提倡具体详实，写得有血有肉。不同意见，鼓励争鸣，对于同一历史事件的过程或侧面，即使各人记述有所不同，也可各存其是，不必强求一致；就是某些内容与已有文献参差，只要是真实的，也可从不同角度来反映，总之，要

兼容并收，力求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不搞一言堂。

从今年七月以来，我们已收到市内外送来或寄来不少稿件，本刊所以能很快和读者见面，是与市委领导同志的重视和有关部门以及许多作者的热情支持分不开的，在此，我们谨致以衷心的谢意。由于我们限于水平，编选出版时间又比较匆促，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江苏省镇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镇江内河航运业

——从鸦片战争到全国解放

市工商联

一、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镇江小轮业起源于一八九八年，在这时期以前，南北来往的渡江旅客，依靠渡船载运。瓜洲方面有红牌渡船，七濠口方面有白牌渡船，均属地方慈善事业，收费很少，称为义渡。扬州方面有运送扬州盐运司盐税银的张、潘两家的课船，兼载旅客。南运河方面，有开往丹阳、溧阳的两路帮船（现在的丹阳码头和溧阳码头即其泊船之处）。其后轮船业逐渐兴起，但开始时多为外商所垄断。最初创办的有德商时为美、英商丰利，买办为王敬斋。美商太昌生、日商大东，为日本人町田所办，买办为米厚安。还有姓戴所办的日商戴生昌。华商只有宁波人董某所办的顺昌，但因资金不足，不久即被外商所挤倒。（此时南运河曾一度行驶轮船，旋因河道淤浅停航）。到了一九〇八年小招商局成立时，只有大东、戴生昌还存在，鼎足而立，号称三公司。随后相继设有天泰轮局（为秦雪潭所办）、永和轮局（为虞洽卿、施肇曾、史悠凤所办）、和泰昌轮局（为瞿季隆、张珊珊所办）。这时内河轮船业华商方面比较抬头。但由于当时地方官僚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对于华商所办的轮业施行压迫手段，种种为难，无所不用其极。使这些纯粹华商轮船业不得不各觅外商为护符，永和改为意商扬子，就是其中一例。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到抗日战争期间：

在这个阶段，镇江轮船业可称为最旺盛时期，除了戴生昌、小招商、扬子、天泰、泰昌、利通等轮局行驶运河仙女庙、口岸、小河各埠仍屹然存在外，因为有利可图，随之在一九二四年又有陆小波等创办的普济轮渡局，始则专驶瓜洲，继之伸长到泗源沟。顺靠嘉兴桥，便利瓜洲、仪征、十二圩旅客不少。同年福运轮船股份有限公司由高邮—扬州线，伸至镇江，开始在镇设局。并参加镇江—仙女庙航线，共有轮船十二艘，客驳八艘，当时该公司负责人为王宣仲。同时创立了航业公会，由王宣仲等主持会务。继由忻礼庠等创设了航业小学。镇通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一九二九年，有轮船七艘，客驳六艘。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创立于一九三〇三年，为南通地方人士发起组织，一九三三年由泰州伸展至镇江。同时江泰轮船公司也随之延伸至镇江。扬子由于认识到利用意商名义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因而取消意商名义改为协和。后因充实资金，扩展航线，原扬子股东三人扩充为六人，改组为扬子股份有限公司，并以忻礼庠为经理。到了一九三七年交通工具由七艘增为轮船二十余艘，航线扩展到长江上游至南京、芜湖、安庆、九江，下至仙女庙、口岸、小河口，除了维持原有北至清江航线经营外，专力经营长江沿岸各埠航线，在镇江轮业中，规模最大。

三、抗日战争时期：

自镇江沦陷后，镇江轮船业的人即各自逃命，航业完全为日人所控制，形成托辣斯，垄断运价，运价之高多至原来运价的二、三倍，搜刮财富，可见一斑。普济轮为日人所虏。扬子、泰昌、镇通、福运等公司轮船客驳损毁殆尽。损失之大，无法估计。至此，镇江轮船业也就完全解体。

四、抗日战争胜利后到全国解放：

抗日战争胜利后，轮船业会员共有廿一家，为招商局、中华旅运社、镇通、江泰、大达、扬子、兴泰、润东、中国、新生等。有的是新设立的，有的是抗战前旧企业恢复的。其中扬子、兴泰、福运、镇江大等几家，均为旧企业恢复经营，但已资力受损，原有组织也多改变。于是各企业负责人不得不动脑筋，从事多方活动，扩充实力。镇通、江泰、大达则合并为三公司联营处。扬子则与上海江浙公司组织联营处，迄解放时为止，尚有轮船业十六家。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在解放大军横渡长江的战役中，镇江联和轮船公司的驾驶员夏阿毛同志主动和他的伙伴们鼓轮出港，冒着飞机的疯狂扫射，飞舟破浪，连番驶向北岸，运载人民子弟兵胜利南渡。在他的带动下，其他轮船也踊跃参加。百舸争流，凯歌齐唱，为光辉的镇江解放史添写了一页壮丽的篇章。

镇江国药业

——从鸦片战争到全国解放

市工商联

镇江国药业有零售饮片、膏、丸的药店和批发买卖的药材行两种类型。药店一向比较稳健保守，很少忽起忽落现象。并因零售利厚，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少，颇能持久经营。所以在本市各业老牌店中，药店占的比重较大。如一正斋膏药店就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存仁堂药店亦超过百年。其他如张万春、公济等，差不多也在半个世纪以上，虽其间各有盈虚消长，一般波动都算不大。至于批发药行则以其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大，其中于镇江开埠后经营进出口业务的药行，受时代的影响，常常兴衰互见。现按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分段概述于下。

一、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镇江历史最久的药店为一正斋膏药店，创自康熙初年。系唐姓以家传秘方，制成能治筋骨疼痛的膏药。起初是舍施性质，以后逐步发展为营业性质。在太平天国革命以前，镇江久已成为南北交通要道，北五省客商，集中本市贸易。一正斋最盛时期，有唐家亲戚包姓投入资本十万贯，扩大经营，职工达七十余人，膏药锅有三十余口。现镇江南门外尚有膏药厂遗址（占地三亩多）。销路对象为北五省及湖南船帮，而以北方的信誉最高，有“过了黄河就发香”的神话，因此销路很广，交易日夜不绝，往来户有年销七、八千张者。后唐、包两家

为争业权涉讼数十年。同时各树一帜，互相竞争，仅五条街一隅之地，曾出现一正斋膏药店九家之多（唐一包八）。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时期，唐姓的店迁往邵伯，营业仍然不差。战后迁回镇江，已改为家庭手工业。招牌称“唐老一正斋”，并冠以“真正”二字。自当时主持人唐萼楼起，直到公私合营，皆很少没有唐姓人员参加。解放后经过公私合营，家传的膏药配方，已化私为公，由中成药厂生产，广泛供应。

同治末年（一八七四）镇江开始有存仁堂药店创设。创办者许道生，其家庭系余姚大族，传说先后曾有兄弟八人，两个做宰相，五个是翰林，有许半朝之称。至许道生时，家里虽已没有那么多的大官，本人却也做到常、镇、通海兵备道。最初因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后，镇江已无大店存在。许又经常往返邵伯、苏州之间，特在镇设店，初名诚仁堂施药局（一说自通州迁来）原以施药为主后变为营业性质，改名存仁堂药号。许氏拥有良田万亩及其他典当、油坊等事业，对存仁堂并不重视，曾一度准备歇业。后交由杨新畲经理，言明只求保本或少赔，杨为人忠厚老实，执事数十年中，存仁堂始终保持稳健作风。

镇江自第二次鸦片战争被列为通商口岸之一，到了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前后租界、海关相继设立，开始成为以进出口贸易为中心的新兴商埠，百业振兴。国药业的药店虽属冷门，以人口消费的增加，营业也有一定的增进，除存仁堂等老店外，新增了黄义兴（原先是药行）程恒春、张万春、怀记（后改公济）皆业务发达，亦可称为国药业中的鼎盛时期，每年营业在二十万两以上，其他中小店亦曾盛极一时，达十数家之多。

根据现有资料，药行亦系在此期间兴起。镇江开辟为通

商口岸后，海运大开。江淮生产，通过、运河长江集中镇江，由江、海轮船转运出口，进口洋货亦在本市集散。主要条件固由长江、运河交会的交通便利，再则进口洋货祇须向海关纳税一次，即可分运各地直运香港或华南闽、浙各地，均不须再向沿途常关，厘卡缴纳捐税。因此经营进出口贸易的行业应运而生，并带动土产土销的行号同时兴盛。国药业在药行方面也不例外。开埠前有木客杜姓，时常贩运浙产药材来长江、运河一带贸易。先设店于仙女庙(今江都)，继迁扬州，字号荣和药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迁来镇江，改名荣昌药行营业对象仍以苏北上下河为主，方式为拆另批发。略后，药行蜂起。其大者为安徽帮黄义兴、宁波帮王义昌、南京帮谢永茂及专营土产土销的协和、森泰等家，并有兼营参、燕药材的怡大、厚生等行。祇需地方纳帖，即可开行，营业数字逐步上升，货源销路亦逐步推广。长江自汉口而下，充济等洲，以及整个江淮河域、苏皖山区的大宗土产如茯苓、丹皮、杏仁、银花、姜皮、桔梗等，皆在镇江集散，推销国内、外各埠。其中主营进出口贸易的药行黄义兴王义昌等还兼营北货(北方土产)出口，并且药材、杂货兼营。黄义兴还在香港设庄办理药材进出口及金针菜、芝麻、花生等北货的出口业务，贸易数量很大。由于药材对客对交较难，故镇江药行皆属自营贩运，拆另批发，但不肯放弃牙行的收益，买、卖正价之外仍兼收行佣(买三卖二)。

在光绪年间，药店和药行所受资本主义商业发展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虽无论在数字上或声数上均普遍上升，但药店业务基本稳定。药行则完全受市场的变化波动较剧，兴衰互见。如黄义兴不但在药店、药行中居首位，即所经营之北货出口亦属大宗，唯当时不仅国内市场有大鱼吃小鱼的现

象，而且进出口商品更受国外行情所左右，常遭人为的风险。特别是津浦、沪宁两铁路通车以后，交通形势变迁，镇江水路交通的地利已失，进出口商业转向衰落。黄义兴的营业也同一命运。加上投机失败，负债累累，以致一蹶不振。其他面向内地与农村者，年月皆有积累。永茂、怡大、厚生、荣昌等行，情况尚能与药店相类似。以兼营土产出口的王义昌等也营业降低不似前半期之直线上升矣。

在铁路通车以后的年代里，镇江药店业务：一般中小店则首先遭受市场不景气影响而日走下坡。几家名牌大店尚能维持一定水平。怀记改组公济后，曾一度大卖噱头，如请和尚念经而出售观音救苦丹之类，大做宣传广告刺激业务上升。存仁堂保守派则始终保本，趋向平淡。同时存仁堂股东正在丧失官职，家道中落，卖田鬻地，收缩企业。幸得经理人郭灿庭因袭前任遗风，抱定“任凭狂风暴雨，我自稳坐船头”，力持稳健经营，不事浮夸，得以保持名牌于不坠。

在此时期中，药行起了新陈代谢的变化。黄义兴失败后，王义昌亦难于支持，由南顺记煤铁号经理投资改组为义昌润药行。经理沈子悌，长袖善斗，并得股东朱中孚在市场上的交往信誉与流转资金的接济，从而得到北路客帮的信仰，掌握了充、济、禹、毫而下的两淮药材，加之历史上在本市集散的上江茯苓、丹皮、苏皖山区的山货和由于物资交流而回头的川，汉洋广各货，不但恢复旧观，抑且空前发展。经营作风则完全采取操纵囤积的手段。如山东银花、杏仁，苏北娄皮、半夏、山区的夏枯草、太子参等。皆一面先以小价卖出压低市价，一面提高买价吸收货源，使客帮无从伸手，货源集中一家。俟购进相当成数，便加价猛抬，从而居奇独市，任意喊价。不但本市无与争衡，即苏州、上海同业

亦望而生畏。后来又吸进崇明镇台、江阴要塞司令徐传龙的资本，更外如虎添翼，垄断市场。总之，在此时期中，凡依靠通商口岸的便利条件，经营进出口业务者，皆曾盛极一时，一经遇到时代变迁（主要是交通失势）便一蹶不振。虽国药业不是进出口行业的主流，所受波动较少，但经营进出口业务的药行亦不可能脱离大势所趋。一般行店也不免受有影响。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到抗日战争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镇江码头进一步衰败，加上军阀内战的影响，市面一片萧条，药店情况尚能维持上期末的水平。大店如存仁堂保持年营业额在一万七千五百元左右，达一、二十年之久。公济经营较活，后来居上。小店虽多则营业清淡，合并营业额不及公济，存仁堂一家之大，其他黄义兴（药店）程恒春、张万春等中牌店互有上下，均已谈不上发展，镇江改为国民党“省会”以后，公济忙于扩张，在城内又开设分店。总之已不是什么行业发展问题，而是大鱼吃小鱼了。

药行方面，由于义昌润由前期独占首席以来，一直持久不衰，使人看着眼热，引起了外行的兴趣。有钱庄业尤九皋开设了恒盛和药行，步义昌润后尘，不数年间营业额亦达到其一半以上。这时各药行的业务各专一门。义昌润脚长路广系以大宗内销为主，直带山货出口。永茂设汉口庄主营汉货。厚生等专营参燕。荣昌专做批另与浙货。恒大（怡大同人经营）则专攻苏北另批，营业额皆达二十万左右（义昌润四十万），业务保持不衰，且均有积累。其刺激兴起之另一原因，则因药行向有赊销习惯，经常赊进赊出，此时更利用社会游资扩大赊销面。对药店继续一般三节结帐的成例，祇要信用保持，货源照常供应。药店一般每年进货一次，拖延更连新

搭陈，无须多出资本，而且利润较厚，纵使营业缩小，亦无虞亏店闭歇。战争、水灾皆对其影响不大。药行的赊销业务对药店极为有利。但药行本身业务全靠对外帮扩大赊销（主要是在外地）。散失在外的帐款数字恒占其营业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平时利润既稳且厚，一遇灾荒兵战，即造成周转失灵。吸收游资利息支出亦相当可观。故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大水灾后，行家即大受影响，业务日缩。抗日战争一起，则几乎大部损失，无复往年盛况了。

三、抗日战争期间：

事变时各行、店纷纷逃难在外，次年陆续迁回。其损失过巨者如黄义兴、程鹤春即无力复业。公济、存仁堂因与之抗衡者减少，业务亦未显著下降，（但总的数字已下降多了）张万春以下二十余家皆逐渐衰弱，半数以上已紧缩为夫妻店了。药行中受交通限制，无从发展。义昌润股东抽走资金，任意挥霍。八年之间，损失几尽。恒大药行始终未停业，对象又系苏北各地，独撑市面，生意集中一家，作风素来稳健。在普遍萎缩声中，一枝独秀。其他皆勉强维持而已。

四、抗日战争胜利后到全国解放：

胜利后各家想重整旗鼓，恢复旧业，但反动时期币制不稳，通货恶性膨胀，而药材又以赊销为主，沦陷期间各家元气大伤，除经营小批发者外，无能为力。直至解放，药店仅公济、存仁堂实力较厚，药行中前期新设者如恒大，此期已算最大了。义昌润、恒圣和则均名存实亡。不过金圆券限价期中，市场发生抢购风潮，很多行业吃了当头一棒，药业影响独小，以系冷门厚利，受限价与抢购的波动均不算大。

药行至此，出现了登峰造极的陋规。其积习相沿的佣金，初则买三卖二。后来逐步加增为百分之三点三到百分之

四。再后又增加店厘、栈力。度量衡改市制后，又创出买方百分之八点五，卖方百分之八点七，山货买进再加百分之八。最后为百分之八点五“折秤”，百分之三的“扣栈力”，百分之六点二的“扣佣”（百分之六点二中包括佣金百分之四，贴现百分之二，店厘百分之零点二）巧立名目，中间剥削至于极点。这些陋规与日俱增地延续了三十年之久，直到解放后才取消。

附记：本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朱中孚的活动情况。

朱中孚，别号信渔，出身于贫中农家，十几岁在宁波学习药店后，得同乡叶澄衷赏识（叶为宁波、上海有名的买办资产阶级，一度入曾国荃门下），提拔在上海塘工上服务，深得信任。叶当时经营大企业顺记号，各大埠均设有分号，经营进口煤、铁煤油，杂货等。镇江设的分号名南顺记即委朱中孚为经理。依靠总号后台，每年营业在数百万之巨。官办裕宁、裕苏两官钱局发生银票挤兑，经加盖顺记戳记，即可流通，可见其实力与信用。

光绪末年（一九〇八）朱接办王义昌药行改组为义昌润。他虽然从不与闻店事，但仗其在社会上的周转能力，供给大量流动资金，并利用南顺记销往北路之货款，经常在各产区套购药材来镇。以致义昌润不数年间即跃居镇江国药业首位，甚且凌驾苏皖各地同行之上，虽经理人有经营能力，但资金活动，仍属朱氏之力。后虽加入徐氏股份，朱氏在义昌润的股额仍占一半。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病故。义昌润将近有二十万资金。但朱氏乐善好施，除此企业别无积累与其他企业。裕苏官钱局原属意朱氏为局长，后推任他人。曾短期担任美孚洋行经理。并首创镇江商团体育会，训练商业中青年，曾担任全浙同乡会会长，商团体育会会长。

镇江江面的古今变化

——从“看海日”和“观潮”说起

江慰庐

不用远去攀登山东泰山山顶日观峰上看“日出”了，每天一亮时，在我们镇江江面上，就能看到一轮旭日从东洋大海里跳跃出来的妙景，这是多么美丽动人的“奇观”啊！——请同志们别认为这是笑话、科学幻想……，在距今一千二三百年前隋唐年代，就还都是这样的。有证据吗？有！公元八世纪初中叶，有位名叫王湾的唐朝洛阳籍诗人，他写过一首停船在北固山下的五言律诗。中间四句是：“潮平两岸失，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①。这后两句译成语体，意思是说：

“黑夜刚要消逝，红彤彤的太阳就从海面上升出来啦。寒冬旧岁，虽没度尽，但阵阵新春的气息，却已从江面上直闯进船里来（按：旧注“时近值新正，而立春则在旧岁之末，故云”）。

由于这两句诗，对仗和意、境都很工整壮丽，曾得到当时宰相张说(yuē)十分赏识，亲手书写了它，高挂在“政事堂”前，让上朝的官僚文士们观摩作为做诗的“样板”。因而到处被人背唱、记录下来，一直流传到近代。同时的一位原籍丹阳名叫丁仙芝的诗人，在他所写的冬天《渡扬子江》诗

里，也有四句话叙述了他从江北乘船南渡江面时所看到的景致：“林开扬子驿，山出润洲城。海尽边阴静，江寒朔吹(zuhī)生②。”意思是说：

“树林开处，到了扬子桥码头，金焦北固诸山冒向眼前，润洲(今镇江)城也就出来啦。这儿是大海的尽头，海边景色非常幽静。江面上阵阵寒意原来是北风给带来的啊！”

联系另一位唐诗人李涉《润洲听暮角》诗“江城吹角水茫茫，回引边声怨思长。惊起暮天沙上雁，海门斜去两三行”，又更可看出：当时位于“大海尽头”，足以饱观黎明“日出”胜景的我们古镇江城，还恰是长江东注入海，“海边”上的“门户(海门)”哩。——我市焦山，从古沿有“海门”之称，这是因为当日焦山东北江中有松寥山，夷山两个小岛，分别峙立在江面上，活象两座阙门的原故。至少从八世纪唐朝名诗人李白的“石壁望松寥，宛然在碧霄……”(《自焦山望松寥山》)、孟浩然的“夷山近海滨”(《望京口》)等诗句里，都已有了对它俩的清晰描写。但因它们实系焦山紧邻(现时传指的“松寥山”，位于焦山山后，已只有一条浅水之隔)，所以即使在唐朝人的诗文记叙里，似乎也有了把它们与焦山“合一”、统称“海门”的习惯了。例如刘禹锡、罗隐等人从北固山东望焦山诗中的“涛来海门吼”、“老怯海门风”、出将入相并且也是以“善画牛”传名今古的韩滉“驻节”润州时，“造楼船三千艘”、在海门大规模地检阅防边水师等诗书文字中的这些“海门”，就原都是“统指焦山”而说的。宋元以后，如王安石诗里的“天宋海门横北郭”及萨都刺等人题咏润洲海门的诗词剧曲，不一而足③。甚至直到十八世纪的清朝乾嘉年代，以首先在一首诗中“句下自注”里指明